

施原——著

王以哲之死

东北军 参与西安事变 始末 [下]

中国抗战命运的关键转折

中国近现代史上各方势力角逐的真实再现
一部以东北军视角揭开“双十二兵谏”内幕之作

从九一八“不抵抗”到“双十二兵谏”，再到“二二兵变”
东北军命运起伏全记录



米田古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王以哲之死

东北军
参与西安事变
始末 [下]

施原——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第九章

电台的故事

意外的舆论反应

华清池“捉蒋”成功后，西安及周边一片喧腾，就连远离西安的黄土高原也不例外。驻在洛川的六十七军就组织当地绅民大闹秧歌，以示庆贺。孙铭九和他的“抗日同志会”同人当然更是兴奋不已。当日，“抗日同志会”等组织以张学良、杨虎城的名义通电全国，宣告西安扣蒋的真相，提出包含“改组南京中央政府”在内的八项解决问题的主张。他们深信，举国欢腾的局面即将出现！

本来相信，这行动能在国际上起码得到苏联的舆论支持，至于在国内，至少像山西阎锡山、山东韩复榘、新疆盛世才、四川刘湘和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能站在自己一边。

却不料，西安事变传开后，国内外舆论是一片哗然。不明真相的人声讨张、杨的信件如雪片般飞向西安，这当中包括胡适这种著名人士。那些信件、报刊署名和广播讲话的内容几乎千篇一律，都是大骂张、杨劫持统帅，大逆不道！

疑虑与不满的情绪在全国蔓延，声讨张学良、杨虎城的激烈文章更是一波接一波，甚至在不明真相的人群中出现了谣言，攻击中共与红军参与西安事变的策划。

一向态度稳健且对张学良持友好态度的《大公报》也在13日，即事变第二天，对事件的情况做了初步报道。

《大公报》第三版的大标题是“张学良竟率部叛变，蒋委员长被留西安”。“率部叛变”一词反映了报方的基本态度。《大公报》评论说：“张、杨之变并非爱国

主义，实则亡国主义。”

何应钦之辈就更不用提了。其雷霆万钧的暴怒，那早就在想象之中。不能理解的是，当年夏天以抗日为号召、制造两广事变反对蒋介石的李宗仁、白崇禧也站在何应钦一边！华北的宋哲元、秦德纯则发忠告，要张、杨确保委员长安全！曾经表示同情并支持两广事变的阎锡山，与张学良也有过“联红倒蒋”的秘密约定，甚至在洛阳庆贺蒋介石五十大寿那天，老阎还暗示张学良，自己准备行动了。可是当他知道西安事变发生时，却一反常态，不但不声援，反而发来一份稀奇古怪的电报，阴阳怪气地一连发问了五个“乎”，堆砌大量陈词滥调，凑成一篇旷世奇文。在电文末了，阎老倌还企图将蒋介石骗到手，然后宣布自己效忠老蒋，以捞取政治资本！韩复榘则是明里一套，暗中一套，里外不是人！只有地处边远新疆的盛世才表达了两边不得罪的立场，但以声称事前毫无听闻，来开脱与自己的干系。

国内出现这样的舆论反应，使“抗日同志会”的同人十分愤怒。他们断定是出了内奸！这事，我们在前文已经说到，那“嫌疑内奸”就是西北“剿总”交通处处长蒋斌中将。蒋中将那时兼西安电信局局长和无线广播电台总台长，主管西北地区的有线与无线通信。“抗日同志会”怀疑是他扣压住“八项主张”的电文不发，还怀疑是他秘密向中央政府告发了西安事变，以致南京得到消息后，控制了全国电信，检查并封锁了消息，致使西安方面在舆论上出现被动。

当时西安城里的人很难判断这些怀疑是否有根据。但真相是，的确有人秘密向南京政权告发了西安事变。我们在前文已经详细介绍过，那人就是东北军驻洛阳炮兵六旅旅长黄永安少将。黄永安因这次告密，有了以后飞黄腾达的资本，蒋斌中将却因那起事件而涉嫌内奸。

这两个人不同的命运，都同样涉及当时的高科技装备：无线电台！

西安事变原本指望能得到苏联政府的支持，可没人料到，苏联的态度更严厉。曾经，为表明自己的“捉蒋”是出于一片抗日救国真诚之心，发表了西安事变的“八项主张”。接着，张学良、杨虎城联合宣布，撤销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提名孙蔚如与王以哲、何柱国等组成联合参谋团，组建

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孙蔚如、王以哲被任命为正、副军团长，随时准备北上对日作战。

对这些行动，苏共《真理报》和《消息报》不是审慎地冷静下来，等待张学良、杨虎城的下一步行动，而是相继发表措辞严厉的社论，抨击张、杨的举动。《真理报》等媒体大肆指责西安事变，甚至指责张、杨是强盗、叛徒，指责他们受日本特务指使！

张学良两次不满地问身边的中共代表刘鼎：苏联的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

不用说张学良自己，他身边的中共党员刘鼎和宋黎，同样是摸不着头脑。不仅是刘鼎和宋黎，就连“红都”保安的领袖也一时难以反应过来。

为弄清这件事，我们暂时搁下被困在西安的蒋介石，转而去讨论一下当年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共产国际）秘密通信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以及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时，借此机会，也顺便把东北军与大别山红军的恩怨，蓝衣社特务及中统特务的一些破坏活动及国际友人史沫特莱、艾黎等人在中国的经历做一个补充介绍。

通向共产国际的红色电波

故事从时通时断的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共产国际）无线电台电报通信讲起。

1928年1月之前，中共中央及苏维埃红军与苏共中央（共产国际）没有直接的无线电电报联系。这一段时间，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其驻华人员和机构的联络主要是靠信使传递信件。

但发生的一系列事变，特别是1927年4月北洋军阀袭击北平苏联使馆区内国、共两党领导人李大钊住处，抄缴了大量共产国际收集的资料，使苏共中央一阵措手不及。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当月在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一连串突发情况，使苏共感到十分突然。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及设在上海的远东局等在中国的无能表现遭到苏共中央的严厉指责。检讨之后，1927年11月，共产国际国际

联络部决定派遣经验丰富的谍报专家亚可夫·鲁德尼克（Jakob Rudnik）来华开展活动，首次建立了苏共中央（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无线电报联系。中国从而有了通向共产国际的第一束红色电波。

亚可夫·鲁德尼克是出生于乌克兰的老布尔什维克。1917年十月革命时，他出任“芬兰团”政治委员并率队攻打彼得堡冬宫。加入“契卡”后，他到欧洲多国执行秘密任务。在调入共产国际前，他有“前科”：因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活动，法国反动当局判处他两年徒刑，刑满后才返回苏联。1924年，他调入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担任与奥地利、意大利、德国等国共产党联络的秘密信使，这秘密信使类似中国地下斗争年代的交通员，只是更高级些，是国际交通员。1927年，鲁德尼克再次被共产国际选中，成为派往中国的最佳人选。他的秘密身份是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下属国际交通处派驻中国的“组织科”负责人。他的上级是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交通处主任阿布拉莫夫，更上一层的大领导就是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部长，也就是共产国际副总书记皮亚特尼茨基同志。顺便介绍一下，阿布拉莫夫同志后来得到提升，接替皮亚特尼茨基当联络部部长，皮亚特尼茨基同志继续为共产国际副总书记。鲁德尼克在上海的工作坚持多年，直到1932年他出事之后，才改由格伯特（即艾尔文）同志接替。

后来人（包括十分精通苏共内部组织结构的蒋介石）都错把鲁德尼克当作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首要头头，那显然是弄错了。为指出其错误，这里有必要把共产国际东方部的远东局、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下属鲁德尼克的“组织科”（联络站）及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GRU，格鲁乌）驻上海的情报机构这三家机构区分一下。

说准确些，当时的鲁德尼克是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阿布拉莫夫下面的一名科长。他的“组织科”与共产国际东方部在上海的远东局及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驻上海的情报机构都是平行机构。这三家都是苏共中央相关的驻沪机构，彼此之间有协作关系，但互不从属。从而，鲁德尼克既没有资格领导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也不是其下属。而苏联红军总参驻上海的情报机构同样不是那两家的领导，也不是从属。顺便提及，苏联红军驻上海的情报机构也就是

如今家喻户晓的佐尔格小组，该小组第一任负责人即理查德·佐尔格。而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归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远东局实际负责人就是兼任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他就是王明同志的恩师，他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有过不可估量的影响。虽说米夫同志与鲁德尼克同志是并列关系，但鲁德尼克关键时刻，还是会在暗中为米夫或王明同志提供支持，同样也会对佐尔格小组提供帮助。后面为简单一些，我们分别用“组织科”、远东局和佐尔格小组来称呼。

对中国革命来说，远东局偏重于政治领导，属于发指示下命令之类的；而佐尔格小组是专攻军事情报的；而“组织科”则是提供实际援助，既管钱财分发，又管秘密交通和秘密电信，且秘密交通关系和秘密通信系统又同时是三家共享的。比如，在一开头，上海的远东局、佐尔格小组就是共享鲁德尼克“组织科”设在上海的电台。当然，佐尔格军情小组还另有专用电台，只是功率比不上鲁德尼克的电台。所以，鲁德尼克的“组织科”是苏联派驻上海机构的公共平台，更显得有实权和神秘莫测。

鲁德尼克同志是在1927年夏天从欧洲出发，以投资移民身份化名来到上海的。他手拿比利时、法国、瑞士等多本欧洲国家护照，他还以商业公司老板、工会活动家和外语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在上海期间，鲁德尼克使用过多个假姓名，登记了八个邮政信箱，开设了七个电报挂号，前后租用过十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商社。他身份神秘多变且在言行上警惕性极高。他还频繁地搬家，不断更换联络地点，不断地更改电话号码。

鲁德尼克夫人也在上海。她原名达吉亚娜·尼克莱维娅·玛依仙柯，出身圣彼得堡的显赫贵族世家，自幼就读于贵族学校，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最后接受了高等教育。她精通法、德、英、意语。十月革命中，她加入布尔什维克。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教育”后，她被委以重任。先后到土耳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开展革命工作。1925年，在维也纳成为鲁德尼克夫人。两年后，也就是1930年初，她带着牙牙学语的幼儿吉米从维也纳来到上海，在沪西愚园路开了一家服装商社作为掩护，协助丈夫工作。儿子吉米在维也纳出生，除学来的德语外，没有一丝俄罗斯口音。

鲁德尼克夫妇在上海租界向远东各国的共产党分派经费、发展地下交通、设立秘密联络点。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操作，他们沟通了苏共中央及共产国际与亚洲其他共产党的联络。同时他们还在上海建立了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上海工作站（通常混称为共产国际远东局）与莫斯科的秘密无线电报通信联系，并协助上海的中共中央实现与各省苏维埃工农红军的无线电报通信联系。

鲁德尼克严格遵守纪律，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承认自己是苏联人，从来不在苏联驻华的公开机构现身，也不发生联系。他更是尽量避免与中共联络员发生直接接触。尽管如此，因工作性质决定，鲁德尼克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系是十分充分的。记录表明，他经手的公司从经费上大力支持了各国共产党，其中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尤其慷慨大方。比如，从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平均每月援助中共的资金达两万五千美元，高出对其他国家的十几倍。

鲁德尼克夫妇经营的最大商号是“大都会贸易公司”。当时这家公司资金雄厚，相互来往十分注重信用，在生意圈内口碑极佳。

同时，鲁德尼克还有一个身份是“赤色救难协会”驻沪代表。因为这个身份，鲁德尼克与后面提到的两个人有过一次间接的关联。这两人是王明及潘文郁。

事情是这样的。

1930年1月12日，中共领导的上海工联在英租界垃圾桥（按：苏州河上浙江路桥）桥堍附近召开一个会议，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化装为工人出席。由于会议疏于防范，招致英租界巡捕房的关注。在会议进行当中，一群巡捕突然闯进会场，把与会成员全部押走，关进提篮桥监狱。

此时王明刚从苏联回来，党内地位并不重要，也没几个人认识他，身上又没有搜出任何文件与材料，况且又被看成一个普通工人，照常理，他不用着急，要不了多少时间，就会被释放。再说，地下党不会弃之不管，总归要营救他出狱的。

但王明同志在狱中耐不住寂寞。正巧此时，有个小牢头从上司口中打听到王明只是个“鸡肋”，迟早要被放出去。这小牢头想趁早从王明身上敲点儿钱，就劝王明“花点儿铜钿买通关节换自由”。

王明正愁没路，就凑上话题。几经协商，小牢头答应帮王明送信。于是，王明写的求援信由牢头亲手交给自己的好友兼顶头上司潘文郁。

这潘文郁又名潘东周，此时他已经取代郑超麟出任中央宣传部秘书和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潘同志兼任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的总编辑，还是当时中央前后两任最高领导李立三和向忠发的笔杆子。刚回国的王明正好被潘文郁安排到《红旗日报》当一名普通编辑。

这位提篮桥监狱牢头拿着王明的信来到鸭绿路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找潘文郁。当知道来人身份就是提篮桥监狱的牢头时，潘文郁不觉大吃一惊！王明严重违反党的纪律，他暴露了党中央最重要地下机关之一——中宣部的所在！潘文郁迅速向中央报警，中共中央果断迁移了中宣部，随即采取紧急预防措施。王明违规的事也报给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米夫不是别人，他当过苏联东方大学校长，王明正好就是他的得意门生。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米夫无法直接参与营救，于是马上求助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的阿布拉莫夫同志，由阿布拉莫夫找到上海联络站（即“组织科”）鲁德尼克同志，由他出面营救王明。鲁德尼克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赤色救难协会”驻沪代表，经他的手营救过许多中共党员，所以他自然是当仁不让地着手营救王明。在交了一笔保释金之后，王明于2月18日上午出狱。

人是救出来了，但因违反纪律，王明同志必须接受党中央的纪律处分。王明因而迁怒于顶头上司潘文郁。这事，我们先说到这里，潘文郁他们的事，我们随后有机会再说。举这例子，就为说明鲁德尼克这个“组织科”还是一个排忧解难的机构。当然也是解决如何与苏联的共产国际无线电报通信问题的机构，因为在上海设秘密电台正是鲁德尼克的主要职责之一。根据以上介绍，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共产国际东方部与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各自不同的职能。

鲁德尼克的“组织科”在上海建立了地下联络站，设立了与莫斯科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的秘密通信电台。这自然也沟通了位于上海的国际远东局、佐尔格小组及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的秘密无线电报往来。这里有一部“国际台”，中方通常称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电台。为实现中共中央与共产

国际国际联络部通信，则还需要另一部电台，那就是“国内台”。“国内台”用于与上海的中共中央及中央苏区及各省苏区红军的电报通信。两部电台采用不同的语言和密码。秘密国际电台的建立，鲁德尼克成了中共通往国际红色电波的第一个牵线人。

上海的党中央与根据地红军联络的国内台必须自己建立并管理操作。所以，自1928年以后，中共中央自己设立了无线电台，负责党中央与各根据地红军联系及向共产国际（通过鲁德尼克的电台）进行请示和交换意见。这项工作由周恩来领导的特科第四科操作。特科第四科又称交通科，科长是李强，成员有涂作潮、蔡叔厚、张沈川、邓颖超等。他们就在上海福煦路403号（今延安中路368号）蔡叔厚的敦电机公司里秘密组装电台，负责并管理通信工作。后来交通科直接改名无线电通信科，科长还是李强，科内几位成员都是中共老党员，其中涂作潮还是1924年由张浩（林育英）在上海工作时发展的党员。

中央特科无线电通信科需要自己的电报密码。这第一套密码就是伍豪编制的，所以又称为“豪密”，邓颖超则是中共第一个译电员，使用的就是“豪密”。从此，中共中央的保密通信工作顺利开展，与苏联的共产国际建立了无线电报通信业务。

由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佐尔格小组需要可靠的中国革命者的配合才能开展工作，而中共中央特科也需要接受他们的指导，就这样，特科第四科的蔡叔厚受特科负责人之一吴克坚的指派参与佐尔格小组，充当电台报务员。中共方面常把苏联红军的佐尔格小组称为苏军远东第四局。从此，蔡叔厚成了苏军远东第四局工作人员。原先，佐尔格因工作需要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向周恩来提出要求，张一萍成了最合适的人选。张一萍也成了苏军佐尔格小组成员。后来，德籍华人吴照高来到佐尔格小组，佐尔格改让张一萍与吴照高扮成一对夫妻，从事内部秘密工作。

1931年，上海发生了著名的“牛兰案”，此案导致秘密电台的中断。

“怪西人”牛兰 I

1931年6月15日上午7时45分，上海公共租界内的汉口路与四川路交叉口以南没几步远的四川路235号4号室，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过了好一阵，屋内一个保姆模样的中国女人赵杨氏才打开房门。身穿警服的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不由分说闯进房间，喝令房间内一位强装镇静的西洋男人出示护照。这位绅士打扮的男主人自称名叫牛兰（Hilaire Noulens），顺从地拿出自己所拥有的比利时护照。但巡捕们一接过护照，马上指责他身份不符，于是就以出示的护照有“伪”为由将其带走并拘捕审查。讲到这里，请读者不要对四川路这地址表示疑惑：当年的四川路是指如今黄浦区的四川中路。它并不包含苏州河上四川路桥以北的道路。四川路235号这门牌就在现今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的斜对面。

巡捕们同时从西洋男士身上搜出了二十七把钥匙，又从屋内搜查出大量的文件。其中有许多写给Noulens的信件，但发觉，所有寄信人姓名都被涂抹了。

随后，也就是当天上午10时，巡捕房巡捕又匆忙赶到南京路49号的Central Arcade大楼。巡捕先从小楼物业管理人员讨来了C字30号房间钥匙，然后与从牛兰身上缴获的二十七把钥匙逐一比对，确认牛兰拥有C字30号房间钥匙。

于是巡捕们检查大楼物业的客户租赁登记册，查得C字30号房间是一位自称Alison（中译名：爱立生）的人从美国二房东H.Van Goldson手里转租来的。开门一搜查，巡捕们发现房间壁柜中的三个保险柜：第一个保险柜保存着“泛太平洋产业工会”秘书处在菲律宾的机密活动资料；第二个保险柜保存有“泛太平洋产业工会”秘书处在日本、朝鲜、印度、澳洲等地活动文件、会计账册及一些与共产党相关机密文件；第三个保险柜保存有各国共产党的各种报告材料。这些材料分装在十六个大信封内，其中大多数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此外，还有几个分别装有八百美元、二十三美元、一百五十日元、六元八角四分银圆的信封。

据此，巡捕房方面臆断此处为共产国际远东局及“泛太平洋产业工会”秘书

处在上海的办事机关。又根据对管理人员进行问讯所得的笔录材料及签署文件的笔迹，巡捕们断定：爱立生和牛兰为同一人！

最后，巡捕又发现一张法文便条，像是其中一个人给另一人的留言。他们猜测，这房间至少还有另一名共同使用人。法文便条的内容是：“今天下午2时半再会。”据此，巡捕们相信，不论是谁约谁，这天下午2时半一定会有另外一个人来到这个房间！于是巡捕们决心在屋内守候，钓大鱼。果然不出所料，他们的守株待兔获得成功：下午2时半果然等来了一个人，她从门外用钥匙开门入屋。守候的巡捕们一阵克制不住地激动！

进门的是一位高雅的西洋女士，她没能见到约定中“下午2时半再会”的那人，却遇到一群鸠占鹊巢的不速之客！她不由得在瞬间露出一丝惊讶不已的神色。但很快，她意识到刚才这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妙的变故，高度警觉性给了她转身就逃的本能反应，只听她嘴里嘟囔着法语，像是解释说自己是“走错了房间”，一只脚已经向后倒退。但一切为时已晚，就在她转过身要走之际，屋内这批华洋混合的巡捕拦住了她，不给她丝毫机会。

当年混迹于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包打听们，全是上海滩上的一批人精，个个奸诈狡猾无比。他们见多识广、身怀绝技、语言能力超强，哪肯如此轻易地放走这条已经咬了钩的大鱼？于是不依不饶，将这位洋女士缠住，并抓住“走错了房间”这句话来找她麻烦。一位精通法语的巡捕马上追问：“既然您说是走错了房间，就表明您不是这房间的主人！那，请您帮助解释一下：您怎么会有此房间的钥匙？”

亮出证件的巡捕们逼她非要回答这个问题：您手中开房门的钥匙从何而来？

这不就涉及入室偷盗行窃的犯罪嫌疑了吗？这位高贵的女士一时忙乱，想不出妥当的回话，只好回答说，不清楚。但她一再声称自己是法国人。巡捕们顺着女士的口气转过话题：“您是法国人？那再好不过了，我们可以陪您到法租界的法国领事馆去确认一下，以便消除误会！”巡捕们不由分说，逼她马上上车就走。

这又涉及另一种伪冒国籍的犯罪嫌疑问题，这问题不比入室偷窃更轻、更简

单。洋女士见状，又连忙改口说自己是比利时人。由此，巡捕们就以洋女士谎言不绝为借口，要进行搜身。他们逼她主动打开手提包，搜查时巡捕们注意到一张留有“MRS Motte, 74, Westend Garden”地址的收据票根。

于是，巡捕房巡捕顺藤摸瓜，立刻按地址“MRS Motte, 74, Westend Garden”赶到沪西愚园路宏业花园 74 号进行搜查，发现此处正是该女士的住处。这样，巡捕房将该外籍女士拘留盘问，最后弄清她就是牛兰夫人，使用的名字为汪德利曾，沪西愚园路宏业花园 74 号是他们夫妇的又一处住所。

巡捕房根据已查到的牛兰持有的文件和二十七把钥匙，继续扩大搜查范围，清查了其他六处地址，另外缴获了大量文件物品。这些文件、报刊等资料共一千零八十一件（份），许多是各国共产党和红色工会的报告请示文件。其中，在会计文档中记述了支付相关工会的资金明细账。牛兰持有的银行账本，是以不同的中国人名义在多家银行建立的账号，共计有流动资金四万七千五百美元。四万多美元在当初不是小数，不能拿如今美元的购买力进行参考。巡捕房巡捕另查得牛兰以中国人名义开立的中国银行账号账簿八本及大量信封等，并有伪造英国护照一本，伪造比利时护照两本。其中一本比利时护照的名字就是牛兰。

更要命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根据查到的文件、信件、电报，破获了部分无线电报密码。比如，破译了牛兰与日本共产党收发秘密电报及信件的密码。密码本就是 1929 年 11 月发行的第十五版日本三省堂新《日英词典》。密码的规则是这样的：前四个字指此词典页数，后二字表示词在页内的位置（如 0984/01 为该词典 984 页第一个单词，即 take）。巡捕房据此破解了许多牛兰与日本联系的文件内容。此外，还查获一本以德文书籍为密码的解码手册。

从破获的文件中，巡捕们发现了牛兰有三个助手。其中两人是：化名为 Marie 的法国籍女士，化名为 Alebert E.stewar 的美国人。后者曾在柏林居住过，自称暖气装置材料商人。还有一个是意大利人 Dr O.Fisher，他是在上海地区小有名气的律师，以经常保护苏联人和进步人士而知名。

法国籍 Marie 女士，原本住在上海熙华德路（长治路）35 号，但她已于案发前的 6 月 12 日乘“奉天”号船前往大连，14 日到达大连，在大连暂住一晚后北上，然后不知踪迹。巡捕们猜测，她是回苏联了。

等巡捕们查到另两人身份时，突然发现，在 6 月 27 日这天，他们都已乘上海开往大连的“大连”号轮船离沪，登记的去向是要经由大连转往德国柏林。但此二人真实去向和动机不清，巡捕们同样只能凭空猜想，他们也可能是去莫斯科报告情况。但巡捕们十分惊讶：该案所有相关人员中，没有一个是拿苏联护照的。

到此，牛兰掌握的机密将面临大量泄露的风险，尤其是与牛兰联系的所有通信密码将可能全部遭破解！

随着牛兰被捕，其手下人员先后逃回苏联。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也随即得到当面汇报，于是他们决定采取紧急措施：首先将所有与牛兰有关的通信密码作废，接着决定切断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上海站纵向、横向的全部无线电报联系。这也就是中共与苏共中央的无线电报通信意外中断的原因。

人们一定感到惊奇，牛兰这么重要的一个秘密机构怎么就如此轻易地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破获？

原来，半个月之前，也就是 1931 年 6 月 1 日，英属新加坡警局以违反护照法为由逮捕了一个自称为 Joseph Doorooz 的法国籍人士。他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信使，或称交通员。其实，警方早就监视了 Joseph Doorooz 的行踪，并知道他另一个名字是 Serge Lefrano。这导致一大批与他有过接触的马来西亚共产党人最终遭逮捕，其中就有进步的华侨青年傅大庆等十七名马来西亚当地居民。

Lefrano 时年二十七岁，真实身份确实是共产国际联络员。1931 年 2 月，他先从西伯利亚来到上海。在上海，他有与他人广泛接触的记录。4 月，Lefrano 离开上海到达新加坡参与红色工会及马来西亚共产党组织工作。这全过程没有逃脱总部在新加坡的远东英属殖民地警察的暗中窥视。

Lefrano 被捕后，警方通过检查他所持物品文件，发现了一个在上海接头用的信箱号码“邮政信箱 205 号，海伦诺尔”。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立即将这一情报

通告给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的捕头。巡捕房便根据这一线索，对 205 号信箱进行监视，便立刻发现，此信箱的租用者是一个名叫“牛兰”的西方人。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牛兰”还用不同的假名在上海同时租用八个信箱。通过对“牛兰”跟踪，查明他住在四川路 235 号，同时在临近的南京路 49 号 C 字 30 号房间还有一个秘密活动点。于是就发生了 6 月 15 日那一幕剧情。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通过报刊披露了拘捕西人牛兰的消息，并且接连公布了一批缴获的文件。由于牛兰对自己的活动范围及与他人联络的情况始终缄口不言，警方最终未能摸清牛兰的真实身份及其他联系人的细节。但英国租界当局根据从牛兰处查获的文件，把他与不久前共产国际远东局在香港成立的一个分支机构——“南方局”联系起来，因为就在牛兰被捕前几天，港英当局在香港也抓捕了“南方局”领导人阮爱国。阮爱国就是法属殖民地安南著名的爱国者胡伯伯！另外，从牛兰处查获的文件中，租界巡捕房还发现了好几名与他有联系的日本共产党人与朝鲜共产党人。那几个人也遭到跟踪监控。这样一来，巡捕们以为自己有理做出判断，牛兰是从事指导和联络太平洋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他们借此怀疑“牛兰”是共产国际间谍，是苏联间谍。

但这依据不足。你说“牛兰”是苏联间谍，那他是苏联人吗？

牛兰夫妇被捕后，一直说自己是比利时人，从来不承认他们是俄国人。比利时人怎能替苏联和共产党国际当间谍？此乃一大怪也！

当年上海街谈巷议的平头百姓都感到十分惊奇。他们认为，爱祖国的人才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不惜冒险去当国际间谍。但一个比利时人，犯得着为苏联去卖命吗？苏联这个国家与比利时人有何相干？所以，这案子太奇了，这西洋人的动机也太怪了！上海滩于是出现了新闻人物：怪西人！

欧洲人牛兰就是“怪西人”，而“牛兰案”就叫“怪西人案”。

说牛兰是怪人，不仅因为其行为的动机古怪，还因为他扑朔迷离的身份。

牛兰被捕后，拘押在厦门路的巡捕监房里。面对巡捕的提审，他坚称自己是比利时人，今年三十七岁，名叫“Vandwegruys”，上海住址是愚园路宏业花园 74 号，从事教师职业。

前面已经提到，愚园路宏业花园 74 号这住址也就是他老婆汪德利曾做生意的地方。

巡捕房马上就此事联络比利时当局。比国驻沪总领事 Mr J.Van Haute 马上对此进行调查。从比利时国内得到的资料表明，真正的比国公民 Vandwegruys 夫妇此时仍在比利时，他们的护照在数年前丢失了。6 月 29 日，比利时驻沪总领事 Mr J.Van Haute 宣布，“牛兰”是在冒名顶替比国公民 Vandwegruys，他手中的护照纯属伪造。

公民拿本国护照干什么？还不是为了在国外遭遇不测时能得到本国政府的照顾吗？可牛兰拿护照却不是谋求签发国政府的保护，而是另有目的。这在上海市民眼中，自然又很稀奇。

租界巡捕房根据被捕者“牛兰”所描述的国籍和出生地及出生日进行调查，发现该国该出生地确实有 Noulens 这个人，只可惜彼 Noulens 不是本牛兰。而且恰是上海被捕的这个“牛兰”盗用了真 Noulens 的名字。经深入取证调查，公共租界当局还发现上海的这位“牛兰”在 1929 年 12 月由德国柏林经苏联西伯利亚来沪时，持的是 C.Alison 的护照。显然，这位 C.Alison 又是一个持假护照的假人！在租用南京路 49 号 C 字 30 号房间时，牛兰先使用 C.Alison 名字租下，然后再转租给另一名叫“牛兰”的自己。

“牛兰”会使用英语、德语、法语、比利时语，能分别以商业会计师 C.Alison 身份，以德语教师 Hilaire Noulens 身份，以工程师 Marcel 身份在不同场合出现。他还有其他十几个别名，不同的名字对应不同的邮政信箱和多个电报挂号！

怪人牛兰身份复杂，简直赛过七十二变的孙悟空，其真假“美猴王”的演变过程让众人看得眼花缭乱。

自 6 月 29 日比利时驻沪总领事不承认牛兰具有比国民 Vandwegruys 的身份后，牛兰夫妇成了国际弃儿。国际弃儿不就会任人宰割吗？于是，牛兰夫妇 7 月 2 日进行了绝食抗议。抗议谁？是比利时政府，是租界当局，还是别的？我们姑且不论。但弱者的绝食抗议还是很能博得上海民众的同情，况且这对夫妻可能是杰出的无产阶级国际战士，逮捕牛兰的人又正是令上海普通市民极其厌恶的公共租界